

書名：《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作者：商偉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頁數：229

商偉先生新著《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以黃鶴樓這處被書寫的名勝為中心，將時間後推或前移，講述中國詩歌史上的互文書寫現象。

“互文”(Intertext)與“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為重要的批評概念，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隨即成為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性術語。“‘文本性’也稱‘互文互涉’，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間結構、故事等相互模仿(包括具有反諷意味的滑稽模仿或正面的藝術模仿)、主題的相互關聯或暗合等情況。當然也包括一個文本對另一文本的直接引用。”<sup>1</sup>

—

“互文性”深刻體現在崔顥和李白這兩位唐代詩人有關黃鶴樓的詩歌書寫中。在《題寫名勝》一書中，作者以六個章節的篇幅詳細爬疏并解讀相關所有詩作的互文性關係，嘗試還原了李白在對崔詩進行不斷地模仿與競爭中的心理全景。

崔詩的經典地位，或許得益于李白。李白面對崔顥《黃鶴樓》一詩擱筆而去的傳說，與在金陵鳳凰臺對崔詩的模擬書寫都使得黃鶴樓與崔顥兩者密不可分。李白作為名勝書寫的“後來者”與“遲到者”，在黃鶴樓前無從施展詩才來戰勝崔顥，於是選擇了另一個地點來鈐下自己到來和占有名勝的印章。作

1 王耀輝：《文學文本解讀》(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67頁。

者推想李白與崔顥較量的原因在於兩人都是少年成名,也是同時代的詩人,詩風都有風流俊爽的一面,起鬥才之心很自然,而較量的結果是崔顥勝出。作者從唐詩選本的收錄情況得出這樣的結論:崔顥身前身後都因為這首《黃鶴樓》聲名遠揚,而李白的競爭之作《登金陵鳳凰臺》在唐人唐詩選本中並不存在。

這兩首詩歌雖然書寫的地點不同,但作者從他們呈現出相似的句式與篇章結構的特點推導出李白的書寫具有“無與倫比的互文編織的修辭技藝”。其實兩首詩的落腳點也頗為相似,崔顥尾句的鄉關之思傳達出自己在政治上謀求出路失敗後的深深惆悵,李白則在自己詩歌的尾句將這種情感表達得更為直白。李白的寫法是對崔顥的詩歌在結構和主題上的模仿。這種互文的形式構成了“派生性的關係”。“作為派生關係的互文手法包含了對原文的一種轉換或模仿(仿作)……風格與原文本相同或相仿。”<sup>2</sup>

李白的鬥才炫技之心並未終止于金陵的鳳凰臺,作者敏銳地揣摩到了李白的不甘心:他回到黃鶴樓這個地點的附近繼續以詩歌書寫來挑戰崔顥的《黃鶴樓》,又寫下《鸚鵡洲》一詩,將崔顥詩歌中出現的地點進行了發揮,出現了“共存性的互文關係”,即“都是把一段已有的文字放入當前的文本中”。<sup>3</sup> 同時,這也是從崔顥詩歌中“派生”出來的書寫。崔顥詩歌中“芳草萋萋鸚鵡洲”此句傳達出他與葬在鸚鵡洲上三國名士禰衡一樣懷才不遇而落寞的感受。李白也承襲了此意。而李白的書寫用“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的溫暖與華麗,加上以鸚鵡為主題的多彩之感成功地樹立起自己不同于崔顥在春日日暮中蒼茫的感受,以及不同于崔詩白雲黃鶴傳達出的高潔之色澤與飄然之風致。從此,他在此處“創造了一個以鸚鵡洲為核心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之中,來自於禰衡《鸚鵡賦》中的鸚鵡替換了傳說中的黃鶴,都是“有名無實”的存在。李白用崔顥的構思方式寫下了這個地點的斑斕景象,而末句也是對崔顥情感的互文,用“孤月”替換了“日暮”,將時間進行了延長與推移。崔顥在一切都要沉入黑暗的時候有一種深深的絕望之感,而李白則表達出如蘇軾般“揀

2 李力:《文本互涉——故事新編的解構性文本策略》,《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

3 同上注。

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的落寞，加深了崔顥原詩中的失意之歎，顯得更加冰冷與沉重，與前面溫暖華麗的景象營造形成更大的情感落差。可以說，這種“派生性”的互文書寫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了崔顥，只不過崔顥勝在不營造不刻意，有自然而感之感；而李白的處處模仿與匠心營造，在他自己與時代都推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審美傾向上，終歸落了下風。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更驚人的話題，即勝出的崔詩也是對前人的模仿：“人知李白《鳳凰臺》、《鸚鵡洲》出於《黃鶴樓》，不知崔顥又出於《龍池篇》”（王琦引田藝蘅《詩談初編》）。《龍池篇》是初唐詩人沈佺期的作品，開篇謂“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田藝蘅以為：“沈詩五‘龍’二‘池’四‘天’，崔詩三‘黃鶴’二‘去’二‘空’二‘人’二‘悠悠’、‘歷歷’、‘萋萋’，李詩三‘鳳’二‘凰’二‘臺’，又三‘鸚鵡’二‘江’三‘洲’二‘青’，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燦然，各用疊字成章，尤奇絕也。”元好問將沈佺期評價為“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指出沈佺期與齊名的宋之問雖然對律詩成型貢獻極大，但作為初唐的宮廷詩人仍不脫前朝齊梁詩風音律精細，對偶工整，辭藻巧豔的舊習。至明代，楊慎在《升庵詩話》中卻談到沈佺期的詩歌與崔顥不相上下：“宋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為第一，二詩未易優劣。”位於盛唐詩壇第一的崔顥向處於初唐第一的沈佺期學習，在詩歌句式和結構上構成與沈佺期詩歌“派生性的互文關係”，而李白“要在沈佺期和崔顥設置的遊戲規則中，擊敗他們二人”。作者從這三者的互文書寫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名勝題寫的模式原來是可以複製的，可以從一處挪用到另一處，而非一次性的產物，也不專屬於一個固定的地點”，最終構成了“一個共用的互文風景”。作者還追溯出，初唐詩人王勃的《滕王閣》在“今與昔、見與不見的時空關係中所展開的感知結構”也成為崔顥和李白學習效仿的藍本。崔顥與李白的名勝書寫與王勃的書寫在意義與結構上構成互文關係，形成互文風景。這不僅體現在詩歌的書寫中，也體現在對名勝的繪製上。作者用圖畫指出《黃鶴樓圖》與《滕王閣圖》在圖畫內容上有著驚人的相似：圖畫的右邊都是巍峨的樓閣，左邊都是以空白表現的茫茫江面。兩幅圖最大的區別在於《滕王閣圖》以“一揚帆而去的孤舟替換了乘鶴遠行的仙人”。作

者總結道：“所有題寫名勝的詩人，都生活在互文關係所結成的這同一張意義網絡之中”。如作者所言，互文關係不僅生成了相互聯繫的名勝，還塑造了“初盛唐的詩壇版圖”，生成了“一部微型的詩歌史”。從沈佺期到崔顥再到李白的書寫印證了 T.S.艾略特的觀點，他認為“一位詩人的個性不在於他的創新，也不在於他的模仿，而在於他把一切先前文學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這樣，過去與現在的話語同時共存。他說：‘我們常常會發現：在他的作品中，不僅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個性的部分都是他前輩詩人最有力地表明他們的不朽的地方。’”<sup>4</sup> 而互文形成的“詩歌史”的觀點又如蒂費納·薩莫瓦約在《互文性研究》中總結到，“與原型的關係包含了對泱泱古訓的尊重，但不是絕對服從。過去對現在的豐富作用表現在語言和形式的各個層面。以這種觀念而言，我們把文學當作連續的歷史來思考，它並不是單由個體組成，它更應該是由連續的時代組成的，整個文學都在過往作家的基礎上取其精華，更上層樓。”<sup>5</sup>

## 二

李白一生多次寫到黃鶴樓，數量之多，形成作者所謂的黃鶴樓情結。他不僅用《鸚鵡洲》的書寫將主題轉移，與崔顥的《黃鶴樓》形成對峙之勢，還寫出驚人的詩句試圖讓黃鶴樓消失：“我且為君捶碎黃鶴樓”（《江夏贈韋南陵冰》），“黃鶴高樓已錘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捶碎黃鶴樓》）。他的“捶碎黃鶴樓”語甚至進入到宋代禪師的偈子中。從傳播的效果來看，李白的黃鶴樓書寫的流播不僅僅限於文人之中，應該說更為成功，但他這些黃鶴樓詩歌的存在卻還是來自崔顥的原詩，對其進行主題的改寫和轉換，仍然與崔顥的詩歌構成“派生性的互文關係”。這是他擺脫不了來自競爭者的永恆陰影。這種互文關係使得他的黃鶴樓詩歌無法完全獨立出來，成為首創，因為在讀者的接受中，他的詩歌字裏行間仍然存在崔顥詩歌的片段。這種派生的“互文關係”在宋代是被認可的超越唐詩的方式，即“江西詩派”的典型手法：

4 程錫麟：《互文性理論概述》，《外國文學》，1996年第1期。

5 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焯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22。

“點鐵成金”，“奪胎換骨”，而在直抒胸臆，崇尚衝口而出的唐詩時代，李白的互文書寫多多少少違背了時代詩歌美學尚自然的風尚，落了下乘，不能成爲名勝的代表詩作。

《醉後答丁十八》一詩中另有句云：“神明太守再雕飾，新圖粉壁還芳菲。”作者摘出此句，來談名勝書寫的生成以及對“互文”的擺脫與超越。名勝的傳播有賴於詩人在名勝之處的題壁新詩。後到的詩人在前人過於高拔的題詩面前，往往會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如前所述，李白試圖用詩歌讓黃鶴樓消失，讓黃鶴樓的粉壁煥然一新，使得他成爲第一個也是最優秀的到來者，在靈感上獲得先機，而且不受干擾地留下經典。如書中第四章所言，書寫和命名是對一個地點真正佔有的方式。這樣，“佔據了名勝的詩人被寫進了當代文學的景觀……以這種方式（題寫名勝的詩歌）影響或制約了後人對它的觀照與感受。”李白在黃鶴樓前的逡巡正是不甘心被崔顥的詩意所影響和制約，而實際的書寫中卻處處可見崔顥詩意的痕跡。他最後索性將黃鶴樓的存在在臆想中變成一張白紙，崔顥消失不見，他成爲第一個提筆的詩人。在這樣的詩歌書寫中，他的《醉後答丁十八》“既是對《黃鶴樓》的模仿，又是對它的擺脫和超越”。這首詩歌擁有了新的主題，不再是“日暮鄉關之思”，在政治上失意的崔氏主題，而是成就了李白“作詩調我驚逸氣，白雲繞筆窗前飛。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漫尋春暉”的謫仙詩風。而詳究其詩意，李白將“丁十八”與歸來化鶴的仙人丁令威重合，在典故中還是出現了“鶴”的主題，依舊不能完全擺脫崔顥白雲黃鶴的詩意，依然存在著與崔詩隱約互文的關係。

對於名勝書寫後來者無法超越前者，窮途末路的書寫，作者提出了另一種思路，即對名勝的佔有並非一個人的感受可以窮盡，先到者的書寫仍然存在可書寫的空白。杜甫詩歌《嶽麓山道林二寺行》中的“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待老夫”句，被作者用以證明這個觀點。宋之問（宋公）的名勝書寫並未成爲杜甫詩興的障礙，杜甫後來居上，“長沙道林、嶽麓二寺之勝聞于天下，蓋因杜工部之一詩也”（楊慎《升庵詩話》）。不僅如此，杜甫還爲後來者留下了這樣的自信與空白，“杜公之後有沈傳師二詩、崔珣一詩、韋蟾一詩，皆效工部之體”（楊慎《升庵詩話》）。在道林寺的相關文獻記載中，其在唐代的“四絕堂”與發展到

宋的“衍六堂”都保留了宋之間的詩篇位置。這竟然是因為杜甫詩歌中的特別提及，“為他站臺撐腰”。從名勝的歷史變遷中，可見得杜甫在中晚唐和宋代的詩壇地位急劇上升。儘管還有元和年間的進士唐扶到此無奈地放棄超越杜甫，並由衷地讚歎杜詩“兩祠物色采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使南海道長沙，題道林、嶽麓寺》），但相比較于李白面對名勝無法佔有的不甘、急切與絕望，杜甫的自信、從容和成功為書寫名勝提出了一種全新和客觀的思路。從杜甫開始，對名勝的書寫不再追隨前人亦步亦趨，形成無法擺脫前人思維的互文書寫，而是跳出前人的構思與筆法結構，以自己的獨特感悟為主要內容，並堅信前人的書寫無法覆蓋一切。初唐的岳麓、道林二寺與銜接盛唐到中唐的轉折時期的二寺也許在視覺的景觀上並無二致，但詩人所處的時代、個人經歷、感受都有著不同于初唐的狀態。宋之間的際遇與感受與後來的杜甫的際遇感受一定會有不同之處。這種書寫在時間縱向伸展中的不同比起在時間橫向比較中（如李白與崔顥）的不同要容易得多。這也是杜甫題寫名勝之勝過李白處。在這裏，互文的影子依然存在，初唐的宋之間與轉折時期的杜甫在書寫中比肩而立，隱隱有“共存的”互文關係。同時，後來的書寫“皆效工部之體”也存在互文的痕跡，但後來者畢竟沒有像李白或轉換地點去書寫，或以想象抹去前者的痕跡，而且充滿勇氣地進行了互文的續寫。

杜甫書寫名勝成功案例，促使作者進一步思考如何擺脫互文的陰影和重新界定互文的意義。杜甫《上白帝城二首》云：“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這句詩進一步推動這一思考：不僅不同時代的詩人感受不同，就算是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登上同一個地點也會有不同的感受，“看到的景色也將會千變萬化”。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前人的題詩與他無關，更不會對他構成直接的壓力。”劉勰在《文心雕龍》的《物色篇》中也講到這一點，他認為外界物色繁複多變，要經過詩人詩思的過濾和提煉，適當應用，涉及詩人主觀的剪裁。這就是說就算每個人看到同一片風景，感受的側重點和書寫的結果也會有所不同。所以，杜甫書寫的意義在於“沒有誰可以通過一首詩，將眼前的景觀一勞永逸地定義下來，並因此獲得對它的永久控制。”此其一。其二，杜甫對即景詩的範式提出了另一種書寫名勝的模式，即“缺席登覽現場”，以懷古的模式書寫獨屬

於自己的情懷。唐代韓愈與宋代的范仲淹都以記體散文書寫了自己從未造訪的名勝，劉禹錫也以神遊的方式寫下了金陵的五處名勝，從此他與金陵這座城市緊密相連。這種書寫模式甚至影響了宋代周邦彥的《西河·金陵懷古》。這兩種題寫名勝的方式“體現為文本之間的模仿與競爭，並且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回應了以文字書寫‘窮盡’和‘佔據’一處名勝的看法。”在這兩種方式的書寫中，“揭示了文本互文關係如何塑造了名勝風景”，周邦彥的金陵書寫與劉禹錫的金陵書寫存在的互文關係使得金陵城如石頭城、烏衣巷等景觀從歷史的滄桑中緩緩浮出，成為城市的名勝風景。同時，後來者如劉禹錫作為名勝的遲到者並不存在如李白式的焦慮，而是以不在場和假想的書寫方式勝出。作者從闡釋脫離互文關係的可能回到思考互文關係的存在意義上。他甚至認為李白佔據鳳凰臺這處名勝不在於他的親自登臨，而是在於對崔顥詩歌的成功互文書寫。崔顥的詩歌已經成為絕唱和經典，李白以互文的書寫方式加入到經典的行列中來。於是，互文書寫不再成為負面的，詩人想努力擺脫的陰影，而是成為被鍍上的黃金，在時間中永恆。

### 三

在此基礎上，作者又重新思考在場寫作與缺席寫作的區別，前者很明顯地具有鍾嶸所言的“直尋”和王國維所言的“不隔”的鮮活真實優點，但後者並非因“失去了與外部世界親密無間的接觸和對外部世界的直觀把握”毫無優點可言，雖說有所退化，但在詩人營造的“經驗領域”，在其內心世界和情感空間中，不在場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詩歌的表現空間，如晚唐李商隱的無題詩既存在“隔”的一面，也有“不隔”的一面，甚至有從“隔”到“不隔”的轉換。<sup>6</sup>作者認為未到現場的劉禹錫的詩歌同樣有“不隔”的境界。而作者強調就是在場寫作的感受仍然繞不開互文的影響，涉及文化心理結構，“我們頭腦中儲蓄的歷代詩文也不可避免地制約了我們對眼前之景的觀察”。同時，語言系統先

6 負娟：《李商隱無題詩的“隔”與“不隔”》，《青年作家》2014年16期。

於書寫存在，書寫的語言與詩人表達的真實意義也有距離，“意義的產生因為經由無窮無盡的能指鏈條而被延遲了”。這個過程也充滿了互文的意義。黃鶴樓和鳳凰臺的命名在這些名勝的傳說發生之後，它們的意義在詩歌的各種典故傳說的所指和引起的情感共鳴中，乃至在後來模仿它們的互文書寫相互勾連生成的意義中得以呈現；李白詩歌中的“晉代衣冠”在時間中化爲“古丘”，因此雖然“晉代衣冠”的命名在李白所處的當下失去意義，但它指向這處名勝包含的城市過往，在歷史上存在過的輝煌：出自烏衣簪纓世家尊貴的王謝子弟演繹的東晉風流——門庭若市，冠蓋雲集，才子輩出。這些都是被“能指鏈條延遲了的”的意義。至於崔顥詩歌中的“白雲”在黃鶴樓這個地點指向時間的亘古和無情，指向在現實中失意進而向仙界尋找慰藉的魏晉“遊仙詩”的主題意義，而在李白的詩歌中則化爲“遮蔽阻隔”與長安和與長安的君王遇合的符號意義。這有同有異，從這點來看，就是同時代的詩人，“在觀察者與他所觀察的世界這兩個方面，都蘊藏著不可窮盡的可能性”。最後作者回到互文這個主題上來，不管是李白還是崔顥的名勝書寫都是“與先前的文本不斷對話協商的結果”，形成互文書寫的錦緞，上面的紋路圖案歷歷可辨，熟悉而親切。

最終，作者回到黃鶴樓這座名勝本身，提出了“文本化的名勝”這一概念。黃鶴樓在歷史中多次被毀又多次被重修，但它不曾因爲實體建築的缺失而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這正是文本的力量，因爲“名勝的文本化”，黃鶴樓依賴于詩人的歌詠和書寫從廢墟中一次次重新立起。詩人可以缺席現場，名勝也可以缺席現場，比如黃鶴樓，又比如沒于長江之下的鸚鵡洲，對它們的書寫進入到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當中，永不消失。同時，“詩歌創造了名勝”，今天的黃鶴樓景觀中的“晴川閣”、“白雲閣”等都出自崔顥的詩歌，因此詩歌不僅重構名勝，還會衍生名勝。被“文本化”的黃鶴樓再現了詩歌的文本世界，其中“擱筆亭”的存在來自盛唐兩大詩人的競技傳說，與書中最初提出問題時對這一傳說的引述構成回環之勢，同時也指向以黃鶴樓爲中心的互文書寫形成的風景，這正是此書闡述的宏大互文書寫中名勝的迷人之處。

商偉先生這本專著如他在“尾聲”部分所言，“試圖借助‘文’與‘互文’的觀念，來處理題寫名勝的現象，並且最終落實在‘名勝的文本化’和‘文本化的



名勝’的論述上。”“互文”這個文學概念和對它的闡釋多見於外國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之中，商偉先生將它引入到中國古典文學中“題寫名勝”這個主題中來。雖然也有學者做過專題闡釋，如蔣寅先生的《擬與避：古典詩歌文本的互文性問題》<sup>7</sup>談到中國古代詩歌中存在這樣的現象和理念，但古人多以“用典”的命名或者以“用典”其他形式如“奪胎換骨”加以舉例和進行總結。但客觀而言，“互文”的概念範疇遠遠大於“用典現象”，因此運用這個理念來看待時間中不同文本之間的相互聯繫會有更寬廣的視野。商偉先生選取了這個理念來看待折疊在“名勝”之中前赴後繼的書寫現象，詳述它們之間模擬、規避、超越的種種關係，同時參考豐富的文獻資料對書寫者自身的心理進行了探究，並不斷地代入書寫者的內心提出一個又一個問題，集中在如何超越前者使自己的名勝書寫成爲經典？這些名勝的書寫者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書寫構成了“名勝的文本化”，展開它們就是一部詩歌發展的歷史。在這本書中，從魏晉六朝到唐至於宋乃至民國的文學理念，構築了名勝不同時期的書寫風貌和特徵，徐徐延展著書寫者希冀垂萬世名，與名勝同在的渴望。在這個過程中，名勝由單純的自然山水和建築景觀成爲“文本化的名勝”。書寫名勝的願望從古至今從未停歇，也許到來的每個人都認爲自己就是那個被名勝久久等待的人，表達出個體生命欲與時間同在的深切渴求。

（作者：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陳燕妮）

---

7 蔣寅：《擬與避：古典詩歌文本的互文性問題》，《文史哲》2012年第1期。